

# 枫桥经验中优秀传统文化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优化探索

段鸿 李晴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102600；

**摘要：**“枫桥经验”，这一源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宝贵智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焕发出全新的活力。通过分析“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及乡贤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为研究其如何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土壤，形成独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典范。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出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如何从中汲取智慧，继续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提供新思路 and 启示，为推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枫桥经验；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乡贤文化；基层社会治理

**DOI：**10.69979/3029-2700.25.08.045

“枫桥经验”诞生于 20 世纪六十年代，其核心内容是：“依靠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有效改造；依靠群众，教育改造有犯罪行为的人；依靠群众，查破一般性案件；依靠群众，搞好防范，维护社会治安。”<sup>[1]</sup>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一步扩展到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就是紧紧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地解决当地发生的各种矛盾、化解纠纷，最大限度地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枫桥经验最主要的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采取评审和说理的方法，最终达到：化解矛盾，

解决尖锐复杂问题。这一阶段“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宝贵经验，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多年来，“枫桥经验”不但是全国政法系统的一面旗帜，而且是我国不同阶段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引头羊，其延续了一部基层治理的辉煌史。

## 1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1.1 以人为本

枫桥经验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

方案，也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经验。枫桥经验在今天继续散发生机，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承袭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这一理念的

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动和依靠群众，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治

理中。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沃土之中，经过枫桥经验的实践，

更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枫桥区干部群众们始终秉持着为民之心，解难题、办实事，绘就群众路线“同心圆”。用好百姓之言，亲近群众、讲方言，坚持群众工作“总基调”，坚持群众参与，践行群众路线。枫桥经验倡导群众自治，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来管理社会事务，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枫桥区人民在调解人的关系上，枫桥经验注重调解矛盾纠纷双方的关系，注重人们的主体性，让双方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等方式，使邻里双方之间主动地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达成共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巧妙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升级。

### 1.2 以和为贵

中国人民自古以来都崇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亲仁善邻”。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邻里”作为一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对于有着深厚农耕文化的中华民族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民族是一个重信义、讲情义的智慧民族，与邻里、邻邦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枫桥人民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主张一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问题就地解决，不上交。在枫桥区中，始终坚持着调解优先原则，充分发挥调解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枫桥人在处理矛盾纠纷和人际关系时，习惯于通过调解、说理、评理，摆事实、讲道理，倡导人们以和为贵，通过协商、以理服人的方式解决问题。注重通过调解来平衡双方的利益关系，尽可能的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枫桥区这种追求和平的精神使枫桥经验在实践中注重平等、尊重和理解，避免了不必要的冲突和暴力，把调解贯彻到

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始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2]

枫桥经验经过多次的改革创新,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之路的经验和典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理念在枫桥经验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枫桥经验以调解矛盾、促进和谐为核心,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理念体现了对于人与人之间和社会各个层面关系的和谐、友善和相互支持的重视,并鼓励人们以和为贵,以和为本,注重通过调解来化解矛盾纠纷,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 1.3 乡贤文化

“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除了上述提到的人本精神与和合文化,还能发掘出在现实社会治理中,群众个人在当地的声名威望或个人优秀品德和技能参与社会矛盾调节,在传统文化中谓之乡贤文化。乡贤文化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睦邻友好等特质,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乡贤文化在古代中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主要有四个功用:贤能治理、以德化民、息讼止争、回馈乡土。这四个功用相对对应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sup>[3]</sup>

乡贤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实则是以乡贤参与矛盾调解的形式体现

现的。在枫桥区,乡贤们利用自身名望、乡规民约、国法家规,将道理与法律相结合解决问题。随着时代进步,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乡贤文化”也在社会发展的浪潮中崭露头角。新乡贤文化就是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的基层干部、企业家、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乡村发展的一种新型文化形态。

## 2 枫桥经验中优秀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在顺应国内外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历史潮流

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增进民生福祉为基石,推动社会治理理念、

方式、机制、手段及能力由传统向现代、由粗糙向精细、由低效向高效的转型升级过程。<sup>[4]</sup>

如何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因素充分与基层社会治理结合使其走向现代化发展,这个问题还亟待深究。

### 2.1 重视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素质向多元高能转化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看,若想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就离不开人这个实践主体,因此必然要重视人的自身发展和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密切联系群众,紧密依靠群众,不仅是枫桥经验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奉行的准则,也是目前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价值——“人民主体”。

扩大参与治理主体范围。在协同治理的指引下,我们应基于党政统一领导的原则,积极引导和培育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可以在城市的基层中开拓新路径。可以在人口密集区域创立服务的乡贤性的社会组织,并将治理能力的提升纳入其日常工作中。此外,在城市社区内,运用乡村多元化治理的创新方法也能达到更好的多元主体参与效果。为了充实城市贤者的储备,应运用多种渠道建立城市贤者库,充分发挥城市精英在城市社区矛盾化解中的积极作用。

强化参与治理主体能力。从工作能力方面入手,治理实施主体在工作时要求理性、公平、在听党领导的基础上能够反思和创新。可通过对治理实施主体进行社会法治知识普及提升、工作业务内容培训、人际交往能力提升方面的帮助。其次,学习能力关系到治理主体的后续发展问题,拥有强大学习能力的人能更高效准确地获取到政策的重点并完美实施,并且个人的学习能力往往与创新能力正向相关。提升实施主体学习能力可以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竞争机制、设置奖惩系统、细化工作分工、明确学习目标的方式激发学习动力。

丰厚治理主体人才待遇。在现代社会,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也愈发凸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尤其在乡村,最能发挥效能的人选当属“新乡贤”类的人才。“新乡贤”群体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精英,他们往往具备更高的教育水平,大都德才兼备、有所专长,当他们回归乡村,不仅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还能以自身影响力,引领群众走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为了吸引如新乡贤人群般的新时代人才落地,应由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为归乡人才提供回乡就业,包括但不限于提升薪酬以资鼓励、职业培训、思想教育、住房家人福利等。整合多方利益、协商乡规民约等方面,大力促进政府与新乡贤间的紧密合作,<sup>[5]</sup>提高基层治理相关措施落地的效率,使乡贤等人才能与群众共同探索适应当地治理的特色发展模式。

### 2.2 预防矛盾为先,转向德主刑辅的治理方式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厌讼情结”，即避免官司纠纷，能调解就调解。矛盾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通常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在解决人际关系矛盾时，秉持和谐观点解决问题，以德治人，以理服人，利用乡规民约等软性规定约束自身行为，才是通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佳径。

从源头治理，规避纠纷冲突。在处理社会矛盾时，要以预防矛盾为主，解决矛盾为辅。在矛盾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加以遏制，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和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易经》有言“未雨绸缪”，树立尚和观念是预防矛盾产生的必要前提。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六》中写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事情要抓住主要矛盾，选好突破口，确定主攻方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调解矛盾纠纷时，也要找好突破口，即从根源解决问题。枫桥经验提到“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若想矛盾在基层就解决好，势必要深入到矛盾的根源，找到问题的本质，通过教育、法律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

增强软法和价值观导向效能。环境造人，从源头解决纠纷方法众多，通过和谐社会氛围感化人心是比较温和的方式，适用于基层社会治理。同时，这也与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三治融合的主要路径相契合。睦邻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和谐社会与社区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大力。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有利于使之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从源头解决问题。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这足以说明邻里互助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佳单元也可以说是邻里。日常生活中，积极宣扬仁爱的睦邻友好观念、以社区或村落为单位多举办升温邻里关系的活动等举措，都可以从源头上化解一定的纠纷。

### 2.3 新乡贤发挥新效能，普法提升群众素质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开篇明义，他写到：“从基层上看去，中

国社会是乡土性的。”<sup>[6]</sup>同时，他也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差序格局。他说到，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属于差序格局，大致可以说成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亲属关系布出的网，好似石头掉进水里激起的水波一样，往外一圈圈推出去，亲缘关系越淡越在网的外层。正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对于乡贤这一角色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崛起和作用发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新乡贤充分融入基层社会。新乡贤融入基层社会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角色的自然演化和功能的拓展。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贤是指在当地享有崇高威望和道德操守的人，通常是村内的长者或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如今，随着时间推移，新乡贤的角色不仅仅局限于道德的楷模，更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引领者。新乡贤融入基层社会，他们利用自身影响力和亲和力，快速融入当地社会关系，做到更精准地把握群众诉求，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为直接有效的服务。

普法提升综合素质。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新乡贤也可以通过在基层进行普法教育的方式，帮助村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所谓“爱民之要，尤先于使民远罪”，爱护群众百姓最重要的是使他们远离违法犯罪。若想使人遵守社会规定，规范自身行为不犯法，最重要的是做好法律知识宣传工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实施的前提则是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知和理解。法制宣传工作做到位，能够提高群众的法学知识储备量，当有矛盾纠纷产生时，有法学素养的群众就能做到第一时间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知法懂法而后才能用法、护法，不犯法。

### 参考文献

- [1] 俞红霞. “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历程[J]. 《中共党史资料》, 2006.
- [2] 陈文清.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N]. 《求是网》, 2023-12-16.
- [3] 李佳男. 新时代枫桥经验解决基层矛盾的现状[C]/山西省法学会. 《第十四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论文集(下)》. 义马市人民检察院, 2021: 11. DOI: 10.26914/c.cnkihy.2021.043336.
- [4] 陶希东.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路径[J]. 《治理现代化研究》, 2018.
- [5] 胡鹏辉, 高继波. 新乡贤: 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 [6] 费孝通. 中小学生学习指导目录《乡土中国》.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09: 001.

作者简介: 段鸿(2000年11月), 女, 彝族; 云南省楚雄州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北京印刷学院;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晴(1999年7月), 女, 汉, 北京房山人, 在读硕士研究生, 北京印刷学院,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